

故宫博物院满文教学概述

吴元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满文部 北京 100034)

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 故宫博物院在其所属的明清档案部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 开展为期三年的满文教学, 培养了一批满文人才。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能够培养出稀有的满文档案专业人才, 十分难能可贵, 其意义非常重大, 影响也极深远。

关键词: 故宫博物院; 满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4)02-0029-06

20 世纪 70 年代, 故宫博物院在其所属的明清档案部启动满文教学工作, 特设满文干部培训班, 历时三年, 培养了一批满文人才。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能够培养出稀有的满文档案专业人才, 十分难能可贵, 其意义非常重大, 影响也极深远。

一、满文干部培训班的起源

1925 年 10 月, 故宫博物院成立, 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献二部, 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1929 年 3 月, 文献部改称文献馆, 并与图书馆分离, 成为故宫博物院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 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1951 年 5 月,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1955 年 12 月, 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 划归国家档案局。1958 年 6 月, 第一历史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 或称明清档案馆, 次年 10 月归属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1969 年底, 明清档案部又回归故宫博物院, 仍称明清档案部。1980 年 4 月, 明清档案部又划归国家档案局, 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从 1925 年至 1980 年间, 虽然保管明清档案的部门屡次更名和变动归属, 但其保管的档案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主要是保管明清两朝遗留并存放在紫禁城内的历史档案, 约计 1 000 万件(册), 其中明朝档案 3 000 余件(册), 其余绝大部分是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 特定满语文为“国语”“国书”, 在其办理公务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保存至今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内达 200 余万件, 其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民族、外交、文化等方面, 可谓包罗万象, 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清中叶开始, 由于诸多原因, 满语文的使用情况每况愈下, 而且越往后越不容乐观。1911 年清王朝灭亡, 更加速了满语文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满语文的使用范围及人群已极有限, 满文专业人才更是奇缺罕见, 而且全国各大院校均无满语文专业设置。因此, 既缺人才,

收稿日期: 2014-08-22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 男(锡伯族), 新疆察布查尔人, 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满文档案整理编目和翻译研究。

又无处培养,成为当时满文档案工作正常开展不可逾越的障碍。1954年,周恩来总理采纳范文澜、载涛等人提出的培养满文人才的建议,责成中国科学院承办落实。原计划招收20名学生,在北京大学特设满文班授课。结果报考生源少,只招到6名。此外,在聘请满文课老师方面也遇到困难,遍觅京城各大院校和科研单位,没有一个能读懂满文的人员。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才聘请到年已70多岁的克敬之先生进行教学。1957年底该班毕业时,只剩下2名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其余4名学生因不愿意学习满文已中途退学。196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刘春,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专门培养满文专业人才。1961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设满文班,招收学生21名,学制五年。当时在北京已经找不到适合教授满文课的老师,因此,从新疆选调通晓满、汉文的锡伯族老师赵玉麟、涂长胜、钟棣华3人授课。1966年7月该班毕业时,正好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其中6名学生被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工作,绝大多数毕业生均被分配到京外各地改行从事其他工作。即使分配到档案馆工作的人员,不久也被派往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因外交部在准备中苏边界谈判时需要利用满文档案,才又被调回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于1972年启动满文档案的整理和翻译工作。然而,满文档案数量巨大,整理翻译任务艰巨,仅靠数量这么少的几位专业人员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197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建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周建人副委员长的信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后,送交国务院科教组具体落实。国务院科教组派人走访周建人副委员长,并到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学院、南开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调查。1973年1月16日,国务院科教组向中央领导提交了“关于满文档案和现有满文人才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该报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 故宫博物院所存满文档案的价值及现状。“这些满文档案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地理等许多方面,可与汉文档案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不少材料对外交斗争、生产建设和历史研究很有价值。如中俄尼布楚条约及阐述签订该约细节的奏折,现我仅存满文本。目前,满文档案已整理的数量微乎其微,很难加以利用,急需整理、翻译。”

2. 国内国外满文人才的情况。“建国以来,老满文人员逐渐自然淘汰。一九六一年,据介绍,按总理指示,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央档案馆协助下开办满文班。学生十八人,另有中央档案馆送去培训三人。六六年毕业,六八年分配。十八人中,中央档案馆要三人(因情况变化,名额比原定大大减少),其余分到各地,除东北档案馆、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几人外,半数左右工作未能对口……社会上懂满文的老人已难找到。”另在“国际上,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教授介绍,日本精通满文的人颇多,并翻译出版过不少资料。苏联、美国也有搞满文的人。”

3. 故宫博物院满文档案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满文档案浩繁,整理工作艰巨。文化大革命后,去年开始业务工作,三人一年初步整理(以类代项)一万零十二件。按此进度,现有人力仅整理一遍即需数十年以至上百年的进度太慢,不能适应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适当增加编制,补充满文人才。首先满文班毕业生可适当‘归队’,将来还可少量培养。鉴于现实生活中除新疆锡伯族仍用满文外,满文已成死文字,满文的工作对象基本上限于这部分历史档案,因此,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否可由故宫直接招有一定基础的青年边工作,边学习。故宫有关同志认为,这样培养更有成效和实用。”

该报告报提交后,当时负责文教工作的姚文元在首页上方批示“周建人来信,说现在懂满文的人快要没有了,建议培养几个人。此信送主席阅后请科教组了解一下并提出意见。这是他们的报告。我觉得篇末的意见大体是可行的。即送总理、康老(暂不送)、江青、春桥同志审批。姚文元,一月十九日。”江青、张春桥分别在名字上画圈,未作任何批示,唯有周恩来总理不仅在名字上画圈,而且在名字右下方批示“拟同意”三个字。这就标志着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故宫博物院培养亟需的满文人才。

二、满文干部培训班的开办

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的国务院科教组的报告,很快通过国家文物局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承办落实。1973年2月17日,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局提交“关于加速整理满文档案和培养年轻满文干部的报告”,分别就“加速整理满文档案问题”“满文干部的‘归队’问题”及“培养年轻满文干部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国家文物局根据此报告,经过进一步研究归纳为两条意见。一为满文干部的归队问题。“中央民族学院1966年满文班毕业生,有16人分配到各地。据了解这16人中可以的约7人……我们拟进一步了解和有关单位商调。”二为培养满文干部问题。“拟在新疆锡伯族中,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和青年干部。他们既熟悉满文又有一定汉文基础,培养起来,可以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再适当招收一些政治和文化基础比较好的复员军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计需要30人。”此两条意见,于3月1日以书面形式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并附以总理批示的“关于满文档案和现有满文人才的一些情况”的报告。

国家文物局将上述意见以正式公文形式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后,等候了近两年时间,仍未见有批复。因此,1975年1月3日,国家文物局党委办公室致函国务院值班室主任侯颖,希望“早日批示”。此函极其简明扼要,而且是用钢笔手写的。全文如下:“这个文我们于1973年3月1日上报办公室。因未获批复,现在再重报一次。故宫明清档案的整理急需满文干部,望能早日批示为荷。”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在此函上直接批示“拟同意”。5月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局颁发“关于故宫博物院招收三十名知识青年培训满文人才的通知”。自此,故宫博物院开始着手办理具体办班工作。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院部首先完成了招生工作,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6名,从黑龙江富裕县招收初中毕业生和在职工作人员各1名,从北京市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1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9名。这30名被录取的年轻人,于1975年8月1日,到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国史馆的明清档案部报到办理登记手续。从这一天起,这30个人就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正式职工,按规定每月发给工资,第一年见习期每人每月工资31.5元,第二年转正后每人每月工资38元。在当时来讲,这种待遇已经很优厚了,大家都非常开心和满意。因当时形势的需要,他们先是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有关政治理论方面经典著作和时事评论文章。9月初学习结束,院部挑定21人为满文班学员,其余9人被分配到部内整理、保管、修复等组工作。经报请院领导批准,成立以沈洪堂、任世铎、王桂芬、关孝廉、刘景宪为成员的教学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和组织教学工作。杨珍和吴元丰分别担任满文班班长和副班长,负责管理班里的各项具体事务及沟通协调事宜。在全班学员中男生冯煜、李松龄、刘建新、关精明、吴元丰、孟宪振、赵志强7名,女生王小红、毛必扬、刘若芳、江桥、沈源、张玉、张莉、宗印茹、罗丽达、杨珍、赵玉梅、郭美兰、郭春芳、陶静14名,共分编3个小组,每组各设组长1人,负责办理组内事务。教室位于东华门内内阁大堂的西厢房,配制有崭新的水曲柳实木桌椅,悬挂玻璃质地镶有深咖啡色木框的大黑板,布置一新的教室整洁明亮,内阁大堂正殿则被作为图书报刊阅览室,整个院落独立于西边喧嚣热闹的开放游览区,东邻散发着古卷墨香的内阁大库,栽有多种树木花草,环境十分宁静幽雅,是个非常适合读书学习的地方。开学典礼于10月20日举行,有院和部领导参加,正式授课从这天开始。

满文班学制三年,没有寒暑假,除每天的正常课程外,还有早晚自习。办班坚持“以学为主”的方针。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一些必要的政治理论课外,本着“课程设置要精简”的原则,开设了满语文、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清代文书制度、档案学基础、翻译学理论、文史工具书应用等课程,其中满语文是主课,贯穿于整个三年之中。在教学方法上,严格遵循“予学——教授——复习的教学环节”,做到堂堂有提问,平时有测验,阶段有考试,毕业有论文。在学习方式上,积极提倡多样化,除坚持课堂授课外,还定期组织各类讨论会,举行专题讲座,参观博物馆,考察名胜古迹,以及适当安排参与满文档案翻译和汉文档案整理等工作,以便积累工作经验。在培训理念上,着重基础知识、基本功、基本技能的“三基”训练,学习满语要背单词、记例句、懂语法;学习现代汉语要掌握汉语拼音、句

式分析及会写各种文体的应用文;学习古汉语要懂得语法及虚词、实词的用法,还要背会一定数量的经典古文;学习历史要了解整个历史发展脉络,还要记住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在课堂教授正课的老师,全部从本院业务人员内选派任教。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分别由明清档案部关孝廉、刘景宪、屈六生授课;现代汉语及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分别由明清档案部刘桂林、王树卿授课;古汉语,由业务部王海芬授课;社会发展史,由院党委办公室杨春沂授课;党史,由院党委办公室陈乃昌及明清档案部韩毓虎、俞炳坤、叶志如、张书才等授课。专题讲座的老师,既有外单位的,也有本院的,其中有中央民族学院赵展,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组马汝珩、李华、张晋藩,北京大学陈宏天,承德文物局袁琛波及本院明清档案部宋秀元、刘子扬、李鹏年,业务部冯乐云等。这些老师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一定的工作实践,不少人还有在中学和大学任教的经历和经验,授课都非常认真耐心,生动活泼,倾尽心血,无所报酬,但仍乐此不疲。他们不愧为满文班得以成功的功臣。当时,很多门课都没有现成教材,也无处去寻找比较合适的教材。特别是满语文教材,故除古汉语课采用了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外,其余教材都由任课老师自编自教,凡以汉文编写的教材由明清部打字室负责打印装订,而所有满语文教材都由老师或学员负责刻蜡版油印装订。

满文班的管理极为严格,除故宫博物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外,院部还特意针对学员制定《学员守则》,要求学员严格遵守,不得违犯。该守则所列款项有“一、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二、树立坚定的革命事业心,努力学好满文专业和其他业务知识。三、遵守革命纪律,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要请假,不得无故旷课。四、上课时专心听讲,不搞小动作,认真、按时完成作业。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六、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七、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爱护公共财物,爱护档案文物。八、注意保守国家机密,不在公共场所、不对外人谈机关情况。九、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十、学习期间不谈恋爱,切实落实‘三晚一稀’的精神。”在开学后的第二年,一位黑龙江籍女学员违反守则第十条谈起了恋爱,在领导和老师数次谈话和劝阻未果的情况下,立即被劝退送回了原籍。1977年夏天,全班学员被安排到承德避暑山庄考察学习,当时承德避暑山庄还未对外开放参观。虽然事先已告诉大家不要在山庄湖里下水游泳,但男学员们在炎炎夏日的烘烤下,面对寂静的山庄,仍抑制不住好奇心的涌动,齐刷刷跳入湖中,在平静的水面划开涟漪,上岸时发现所有外衣不翼而飞,经打听才知道被山庄的管理人员收走。如此狼狈的事,当然无法瞒过向来管理严格的领导和老师。当天晚上,各小组立即召开“批判会”,首先让游泳的学员逐一作检查,而后参会的其他老师和学员提出批评。最后各组会议的核心问题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点,要找出此次游泳的“组织者”。无论是游泳的学员,还是没有游泳的学员,大家平时彼此间非常友善,而且对此事还能理解和宽容,尤其同情衣服不见后的窘况,因而始终无人“揭发”倡议者,否则肯定有一位男学员会受到纪律处分。如此严格的管理,无疑有助于培养全体学员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

学员们经过刻苦学习,绝大多数取得了优良成绩。据考试成绩统计,满语5分者9人占45%,4分者8人占40%,3分者3人占15%;现代汉语5分者6人占30%,4分者14人占70%;古汉语5分者9人占45%,4分者8人占40%,3分者3人占15%;中国通史90分以上者10人占50%,80至89分者7人占35%,70至79分者3人占15%;明清史90分以上者16人占80%,77至89分者4人占20%;近代史90分以上者16人占85%,80至85分者3人占15%。如此好成绩的取得,除学员自身的努力外,还来源于教学领导小组的精心组织,以及各位教师的认真教学和无私奉献。

1978年7月15日,满文班在明清档案部新办公楼二层大教室内举行了结业典礼,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彭炎,副院长田耕、肖正文,明清部档案部主任沈洪堂及主要任课老师出席典礼,并进行了总结,表彰了评选出的7名优秀学员,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在楼前合影留念。9月9日,故宫博物院根据满文班结业总结撰写“关于满文干部培训情况报告”,呈送国家文物局并国务院办公厅,同时报送中央宣传部。至此,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批较大规模培养满文专门人才的工作圆满结束。

三、满文干部培训班的作用

满文班结业后,全部 20 名学员都被留在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先后有 8 人调离,其中 4 人从事与满文档案或相关的清史、满学、档案、语言等工作,4 人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余下的 12 人一直坚持在档案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满文班结业迄今已整整 36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壮大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除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黑龙江富裕县三家子村、黑河地区五家子村有人会说满语外,其他地方都已无人会说满语,而且各大院校都没有培养满文人才的机制。满文专业人员极其稀缺,不要说满文档案工作,就连满语文的基础研究及教学工作都无法开展。经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示,国家先后两次开班培养了 23 名满文人才,但因当时的特殊条件和不同原因,结束学业后绝大多数人没有从事满文档案工作。1975 年,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开设之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 29 人,除原有 6 人和满文班学员 20 人外,其余的 3 人是按照国务院批复精神从辽宁“归队”的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生 2 人和从江西“五七干校”返回的原分配到明清档案部的 1 人。对总人数不到百人的档案馆来讲,集中有 29 名满文专业人员,不失为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近年来不断招收新人扩大满文档案专业队伍,但迄今尚未打破之前的纪录。另外,满文班还有两位旁听生,一位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张承志,一位是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黄润华。经过三年时间的学习,他们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满语文,成为各自单位的满文人才。张承志后来改行从事文学创作,成为著名作家;黄润华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从事民族古籍工作,获得正高级职称,任缮本部主任。

2. 加强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能力。本次满文班开设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是教学的方式,都与正规的大学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强调针对性和实用性,着重提高业务能力。在满文班学习期间,结合不同的教学阶段和内容,参加翻译满文俄罗斯档案、整理汉文朱批奏折、编制档案目录、撰写档案全宗介绍、刻印教材,以及将档案库房从内阁红本库、文华殿等处搬迁到新建大楼等实际工作。另外,在招收学员时就以正式职工编制招录,由本单位派人直接到指定地区学校挑选,保证了学员的基本素质,同时学员从开始就明确学习的目的和将来工作的方向,比较自觉地注意提高各方面工作技能。这样,通过三年的学习和培训后,绝大部分学员都具备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基本技能,从而加强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的整体能力,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满文档案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 加速了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工作。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是保存满文档案数量最多的单位,从 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到 1978 年满文干部培训班结业,在长达 53 年的时间里,所整理著录和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数量,与实际保存的数量相比较,可谓微乎其微。按科学方法逐件登记编目的档案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档案是成捆成包为单位清点登记的,而翻译出版的数量则更少,只有在 1935 年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和 1959 年出版的《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内,分别收录 26 枚满文木牌及 11 件盛京将军舍图肯等人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共计 3 000 余字,翻译工作基本没有开展。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及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翻译出版有《满文老档》等清入关前形成的档案史料,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造成如此结果,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缺乏能够胜任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满文班学员毕业后,随着满文专业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经过 36 年的坚持不懈努力,极大提高了满文档案的整理著录和编译出版速度,成绩斐然。档案部现已整理满文题本、录副奏折、朱批奏折及各簿册等 170 万件(册),所有 200 万件满文档案的秩序整理完毕已指日可待;又完成了满文录副奏折、满文题本、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雍正朝吏科和户科史书的标准化著录工作,共形成著录条目 32.7 万

条;此外,翻译出版满文档案24种、74册、2470余万字,编辑影印出版满汉文档案8种、781册,编译出版满文档案及图书目录3种、14册、1200万字。

4. 推进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满文班学员毕业后的第二年,为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语言学理论知识,被分批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语言学课程,均获得单科毕业证书。当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后,其中4人先后考上清史研究生,其中硕士3人、博士1人,学成后2人出国未归,2人分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之后还有2人先后调离档案馆到北京市档案学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工作。除出国和调离改行的4人外,无论是调离档案馆后在科研单位和协会工作的4人,还是留在档案馆工作的12人,这16人都坚持利用满文档案开展学术研究,分别在清史、满学、文献学和民族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获得正高级职称者8人、副高级职称者6人、中级职称者2人。又有3人,还分别担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巡视员兼满文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成为各该领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带领开展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有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这些满文班毕业的学员,利用鲜为人知、他人无法看懂、第一手的满文档案史料开展学术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有不少创新,其新的观点和新的见解填补了诸多以往学术研究的空白。另外,他们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编译出版了大量满文档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史料,极大地帮助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系统开展。

当年满文干部培训班结业时,大家已经感觉到时代变革的春风正在扑面而来,经全体学员反复商量,一致同意在全班毕业照上题写“三载攻读战犹酣,共绘中华飞腾年”14个大字,以表达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各自力量的心愿。回眸以往,满文班全体学员没有辜负国家的精心培养,36年来一直在践行年轻时立下的誓言,而且现在继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努力着。2015年10月20日将迎来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开班40周年,谨撰此文纪念。

Summary on Manchu Teaching from The Palace Museum

WU Yuan - feng

(Manchu Department,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The Ming - Qing Archives' Department from the Palace Museum has set up a training class for Manchu language officer in seventy years 20th century. It'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train the rare people of such talent at that special time.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Manchu;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附圖



故宮滿文班學員畢業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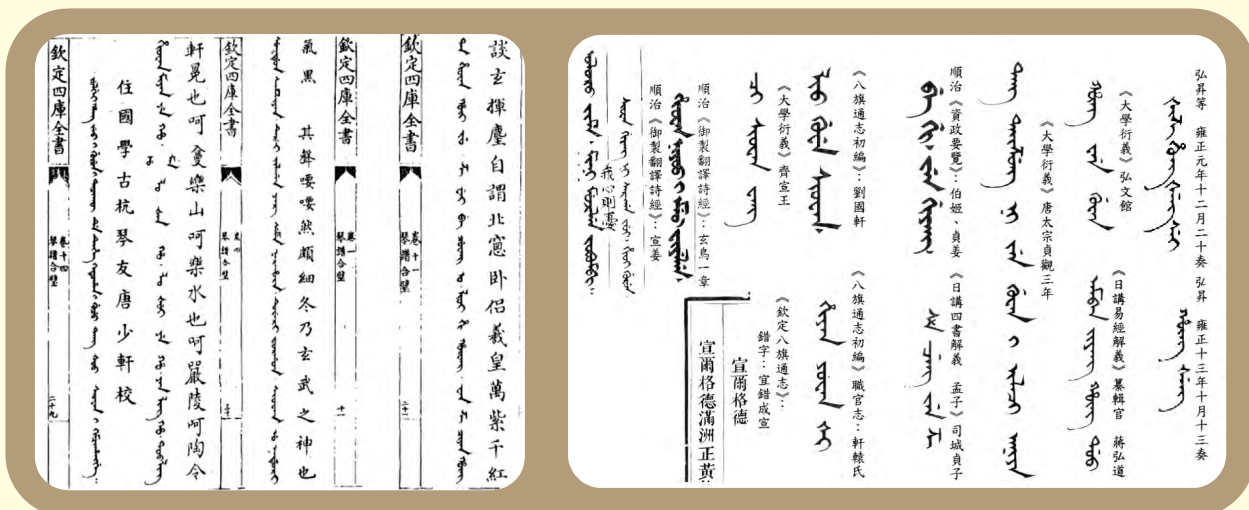
黑龙江左岸旧瑗瑋上下江示意图



故宮滿文班學員上滿語課

上右《滿文〈黑龙江左岸旧瑗瑋上下江示意图〉初释》附图

上左、中：《故宮博物院滿文教學概述》附照
下：《清朝滿文避諱漫議》附图



“玄”“軒”二字的滿文拼寫

尖團音的滿文記錄